

阿·维诺格拉多夫著

时代三色

Shidaisanse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时代三色

〔苏〕阿·维诺格拉多夫著

范信龙 井勤荪 臧乐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А. Виноградов
ТРИ ЦВЕТА ВРЕМЕНИ

本书根据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 1956 年版译出

时 代 三 色

〔苏〕阿·维诺格拉多夫著

范信龙 井勤荪 臧乐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1.625 插页 2 字数 481,500

1985 年 6 月第 1 版 198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901—27,500 册

书号: 10188·499 定价: 3.00 元

内 容 提 要

《时代三色》是苏联作家阿那托利·维诺格拉多夫(1888—1940)所写、记述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生平和创作的长篇传记小说。

书中主要叙述司汤达自随拿破仑军远征撤回后,不久侨居意大利,后又被迫回国,七月革命时期任驻外领事,直至一八四二年病逝巴黎的一生经历;讲到他跟其他法国作家梅里美、巴尔扎克、雨果、缪塞等以及烧炭党人的交往;阐明司汤达在写作《拉辛与莎士比亚》、《阿尔芒斯》、《红与黑》、《巴马修道院》等这些主要作品时的社会背景。本书说明他的一生所经时代象征着三种颜色的消长和变迁:代表革命的红色,教士道袍的黑色和波旁王朝旗帜的白色。

本书不少篇幅摘自档案文献,使史实比较信实可靠。

序 言

一个艺术家要想写得出色，就需要明察，甚至还需要预见。至于他必须具有渊博的知识，那就不用说了。有的艺术家描绘生活真实的技巧，远比赢得“伟大”称号的历史学家完美得多。之所以这样，不仅因为研究书籍、文献不同于研究活的材料、研究人；也不仅由于或远或近发生的过去的事情不同于昨天刚刚发生、今天正在发生和明天必将发生的事情的缘故。

历史学家总是从自己时代达到的成就的高度观察遥远的过去，叙述已经终结的过程，他象审理罪行的法官或者象罪犯的辩护人那样进行叙述；他或者满怀同情慨叹专横暴虐而不受惩罚的“美好的旧时代”，或者给以往的某些事件涂上特别阴暗的色彩，以使自己时代的浓重黑暗显得光明一些。历史学家的“客观主义”，如同上帝的公正无私，同样是一种神话。关于上帝，司汤达说得非常好：“唯一可以原谅上帝的，就是它不存在。”

象在一切领域里一样，这里也有例外。吉本^①用十八世纪人的眼光，透过十五个世纪的迷雾观察“罗马帝国衰亡史”，然而他把基督教的发展，它的破坏作用和政治上的胜利描绘得那样鲜明，仿佛他就是目击者，亲眼看到了以精神奴役巩固肉体奴役、以教士和僧侣的极端宗教狂热代替批判思维的泛神论自由这一过程。但吉本才华横溢，具有艺术家的气质，他有使往事更新、死人复活的罕见本领。一般说来，基佐^②对历史学家的评论

十分中肯，他本人就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说：历史学家“纵然无意欺骗他人，他也往往以自欺开始；为了证实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他会落到不准确的地步，还自以为无关紧要，而他的偏爱又排除了他的怀疑”。苏联读者当然了解，这话指的是阶级对历史学家的思想“自由”和思想真实性的压制。

艺术家首先是自己时代的人，是时代悲剧和正剧的直接观众或积极参加者。艺术家是可以做到客观公正的，只要他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摆脱本阶级偏见和成见的影响，具有正直的眼光，只要他本人就是时代中坚力量的一分子，这创造性的力量所追求的，正是劳动人民权力意识发展的过程所明确提出的目标。文学家工作的特点，不仅在于直接观察和实验的力量，而且在于他所加工的活材料能够反抗文学家阶级爱憎的主观随意性。正是活材料对艺术家个人主观随意性的这种反抗力量才能解释下面的事实：在资产阶级社会环境下，文学家们日益成为描写本阶级日常生活的公正的历史学家，他们无情地描绘本阶级的弊端，它的庸俗、贪婪、残忍和它必然的“衰亡”过程。于是，欧洲的作家们对市民阶级生活稳固性的颂词逐渐变成了挽歌。

司汤达是几乎在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的第二天，即着手透彻、鲜明地描绘资产阶级内部必然的社会解体征兆和资产阶级愚蠢的鼠目寸光的第一位文学家。法国文学史家们虽然把司汤达列为“经典作家”，但却是有保留的。未必能说，法国人为司汤达感到自豪。

① 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近代罗马史学中占有一定地位。

② 基佐(1787—1874)，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著有《英国革命史》等，资产阶级的右翼代表人物。

法国批评界对这位最独特的艺术家和另一些作家抱冷淡态度的原因，本书作者阿·科·维诺格拉多夫在一篇序言中已经十分正确地指了出来，那是他为法文书籍的俄译本所写的一系列极有价值的序言之一。阿·科·维诺格拉多夫肩负的社会义务，是进一步发挥他的见解，说明法国批评界对某些法国作家的作品所具有的真正社会政治意义何以评价不公和错误的原因。这些见解无论对我们的读者，还是对青年作家都是极为重要和富有教益的。

司汤达是作者的面目被批评界歪曲的一个十分鲜明的例子。朗松^①教授在他的《法国文学史》中论及司汤达的时候说：“他个人的冒险经历毫无趣味。”

这些话说的是一个曾经参加过拿破仑的国际大军向莫斯科进军，经历了这支军队退却和覆灭悲剧的人；说的是同意大利烧炭党民族革命运动最主要的领袖们关系密切，曾经被奥地利政府判处死刑，几乎在警察监视下度过了一生的人，——这样说倒也是十分有趣的。

不记得是谁，好象是法盖，曾经指出过，在军队撤退和挨冻的悲惨日子里，在纪律彻底废弛的日子里，司汤达每天总是刮了胡子去办公，他军容整齐，“神态自若，没有失去分析事件的癖好，似乎不相信拿破仑会失败”。

这是意志坚强、具有历史观点的人的特点，他虽然钦佩拿破仑的毅力，但却了解，如果欧洲的征服者指望俄国农奴暴动的打算未能实现，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就此停顿了。

朗松说：“司汤达的文学活动渊源于对积极的生活的爱，并

^① 朗松(1857—1934)，法国文学史家，资产阶级文化史派代表人物之一。

以这种爱为指导。”“司汤达最爱毅力”，——这一猜测的正确性为司汤达不平静的一生所证实。司汤达著作的真正的和唯一的主人公，就是追求生活的意志。他第一个写出了一种觉察不出作者把自己的倾向强加于人物和现实的长篇小说。他以自己才华的力量把一个司空见惯的刑事犯罪案件提高到对十九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历史和哲学研究的高度。他第一个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中发现并气势雄浑地描绘了于连·索黑尔，这个二十三岁的青年、这个“满腔愤懑地反抗自己在社会中的卑贱地位的农民”，他所处身的社会是发了财的小市民阶级和革命年代贫困潦倒而市侩化了的贵族的社会。

于连·索黑尔生活在这样的人中间，他们“每天早上醒来，从来用不到痛苦地去想：‘我今天上哪里吃午饭呢？’”引号里的话是于连自己在本阶级的法庭上说的。但是，他的这一席话，似乎违反了作者的意志，贬低了自己未来的作用和自己悲剧的意义，这一悲剧并未与他的死亡一道结束，而是继续了一百年，并且至今仍由欧洲的青年扮演着。

资产阶级社会砍掉了于连·索黑尔的脑袋，但这个爱好虚荣的青年人在欧洲和俄国最伟大作家们的许多作品中——在布尔维-李顿和阿勒弗莱德·缪塞、巴尔扎克和莱蒙托夫、显克维支、保尔·蒲尔哲等人的长篇小说里——以别的名字复活了。他甚至也在我国的斯列普佐夫、波米亚洛夫斯基、库谢夫斯基等未得到充分评价的作家的粗略而真实的素描中得到了再生。

司汤达的于连·索黑尔是所有这类“英雄人物”的鼻祖，他们步入生活的时候，满怀信心，以为高度发展的智力定能保证他们得到与之相当的崇高和独立的社会地位，保证他们思想和意志的自由。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虚荣心极重，“不按照教

、
条”生活——不按照使理智和意志和谐一致的社会教条生活。资产阶级社会虽然充斥着许许多多它自己制定的教条，可是使动物本能人性化的这一主要点是没的，尽管在资本主义制度无政府条件下有着使动物本能人性化的可能性。

司汤达在长篇小说《红与黑》里描绘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矛盾的悲剧。关于这个悲剧，一八七〇——一八八〇年间，我们这里进行了那么多徒劳无益的议论，这一悲剧只有到市民社会最终灭亡之日才能根除。

被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创作增加了这类悲剧的数目，以更加粗野的形式制造出成千上万这种悲剧，无需成为预言家便可以断言：这必将加速小市民阶层的灭亡。

司汤达的敏锐智慧和想象力使他看清了市民阶层的假仁假义和虚伪，看清了小市民队伍中矛盾的无法调和性。阿·科·维诺格拉多夫十分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批评界闭眼不看司汤达得出的危险结论。他是当时文坛上的异己，他了解这点，所以戏谑地、却几乎正确无误地说：“一九三五年时，人们才会阅读我的作品。”^①人们开始阅读和理解他的作品比他说的要早些，而文学家们过去一直在学习并且今后还将长期学习他的作品。

看来，人们还将长久地根据法国批评界的评价评论他，连富于才华的茨威格^②也是这样，他把司汤达归入“自己生活的歌手”之列，却没有发现他是一个诗人和创造性毅力的赞美者。

对我们的青年文学家来说，向善于把刑事案件报道中的普通事实扩展为一幅自己时代广阔鲜明画卷的人学习，是特别有益的。我们的青年作家常常糟蹋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题材，因

① 参见本书第四十九章。

②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作家，文艺评论家。

为他们着手写这些题材的时候，对昨天的材料没有进行十分认真的研究，而对转瞬即逝的今天的现实只有浮光掠影的了解。

下面略谈几句司汤达的“风格”。朗松也象许多人一样，说：“司汤达著作的形式没有什么独特之处，没有任何艺术性，只不过是思想的分析性表现而已。”巴尔扎克对司汤达的表现技巧评价也不高。茨威格显然也受了法国人见解的影响，断言说，司汤达写作的时候，“全然不注意文体，不注意完整性和浮雕性，似乎这是给朋友写的私人信件”。假如可以把司汤达的著作比作书信，那么，把他的作品称为致未来的书信也许更恰当些。

有一种评价与一切对司汤达语言艺术的否定评价相反，这就是居斯塔夫·福楼拜在给自己的朋友阿尔弗莱德·勒·帕特温的信里提出的评价：

“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读完了司汤达的《红与黑》第一卷。这部作品才思优美，细腻入微。风格是法兰西式的；但这哪是普通的风格？这才是真正的风格！这是目前人们全然驾御不了的那种古老的风格。”

最伟大的文体大师的这一评价压倒了批评家们的一切评价。顺便指出，这些批评家还指责司汤达写得匆忙，因为他“不愿给艺术家修饰、美化现实的时间”。但是，只有当现实是其主要人物——人民大众为摆脱肉体和精神奴役而进行的坚持不懈斗争时，而不是当现实只是“编造的神话”、直接或间接为奴役人的制度辩护时，只有那时现实才是需要和值得“美化”的。

本书表现了人们迄今未曾看到过的司汤达的本来面目。

马·高尔基

一九三一年

作 者 的 话

一九三三年是亨利·贝尔诞生一百五十周年。一九四二年是司汤达逝世一百周年。漫不经心的批评界没有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认真地纪念这两个日子。但是，有一件意义更为重大的事情纪念了司汤达这位作家：二十五年来，他的作品在苏联的印数超过了全世界一百年间发行总数的一倍多。司汤达是被公认为“苏联的”作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经历过象司汤达这样奇特的命运。他的长篇巨著问世之后的一百年是资产阶级批判智慧衰老的世纪，是我们这位作者恢复青春的世纪。这一合乎规律的现象竟被一些法国人视为“怪事”，他们硬要把作为人和作家的司汤达的完整形象撕成碎片，并在每一碎片上写上伪诠释者的名字。

本书试图恢复司汤达的完整形象，但不是用几十年来法国批评家们以及那些形式主义派别的“文学研究家们”留下的碎片去进行拼凑。这些“文学研究家”跟在法国评论家们的屁股后边亦步亦趋，只是简单地把 Ed. pleiade^① 的经过政治阉割的“假评论”搬到俄文版本中来。本书作者则大胆地以自己对文献档案材料进行的十分成功的新探索作为依据，使自己不致成为那种简单地翻译法文版中别人思想的“权威”。市侩式的批评家艾米尔·法盖象检察官似的叫嚷，要把司汤达作为当今的危险人物进行社会审判。“司汤达只对下等阶级感兴趣！”“司汤达不信

仰宗教，是个积极的无神论者！”“司汤达传播古老唯物主义的毒素！”总之，“命运把这位作家安排在对格格格不入的时代，同他开了一个恶劣的玩笑。”

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毫不畏惧地接受这位法国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继承者。高尔基写道：“司汤达是一个作者的面目被批评界歪曲的十分鲜明的例子。”“未必能说，法国人为司汤达感到自豪。”直到现在，强烈的好奇心仍然使阅读司汤达作品的法国人激动不已，他们想认识这位作者而作的无力尝试，证明他是不朽的。

但是，人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在有意无意地歪曲司汤达。一八二八年的一个评论家用《阿尔芒斯》的主人公马利维尔子爵特有的男性的软弱代替他的阶级软弱性，他当然是在故意歪曲司汤达所做的社会分析，这最清楚地证明了他自己这种帮会式批评的软弱无力。一九三〇年，康明日伯爵在《骑兵司汤达》一书中把司汤达写成唯美主义者和冒牌绅士，康明日先生当然会不由自主地只注意司汤达经历中他浅薄的头脑所能理解的那些特点。而那些为了标榜独特的客观性，借口“司汤达身上有卑鄙下流和虚与委蛇的特点”，而要求我“降低司汤达的形象”的人当然只能证明这句俗语的正确性：“谁害什么病，谁就老谈什么病。”在出版本书第五版^②的时候，我可以幸福地说，读者对此书的热情是出于向往未来的美好情操，这种情操过去曾经鼓舞我国青年，现在又使司汤达变得对于我国比对资本主义国家更加亲近。司汤达本人最好不过地表达了这种未来感：“直到现在还在盲目

① 《七星》出版社(法文)。

② 指1945年版。

传说中的从前的黄金时代——就在我们的前头！”

本书在取材方面绝对新颖之处，在于这些编写成一个整体的材料是摘自屠格涅夫大量的档案文献。这些材料不仅在司汤达的祖国无人知道，就是在俄国也未曾出版过。对书中使用这些材料的方法尽可以提出异议，但发表这些材料这一事实本身，就对作家同俄国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说明。

目 录

序 言.....马·高尔基 1

作者的话..... 1

序 幕..... 1

第一部.....71

第二部..... 201

第三部..... 331

第四部..... 547

序 幕^①

第 一 章

时维九月，初升的朝阳刚把淡淡的晨曦射向挂满了红艳艳果实的花楸树的梢头，突然，一声号角划破了长空。接着，众号齐鸣，还在晨雾中瞌睡的古老俄罗斯庄园顿时活跃、骚动起来。法国近卫军骑兵部队各骑兵连匆匆列队，跟着大军在狭窄的小道上排成三路纵队出发了。纵队前部已经走下山坡，绕过池塘，穿过悄然无人、不见一缕炊烟的村庄，一列列队伍鱼贯地行进在光秃秃的石头山和长满小橡树的丘岗之间，向莫扎伊斯克大道前进。十分钟后，纵队象一条蜿蜒游动的巨蟒，前后不下一公里，它的尾部和另一支随后出发的纵队之间出现了一大段距离。这时，在两支纵队之间，从惨遭毁坏的贵族庄园的几根石柱当中，闪出一位身跨白马的骑马者，他眯缝双眼，皱着额角，迎着太阳向大道了望。离他一百步远近，有一群服饰华丽的人骑行在后面，他们没有排成骑兵队列。这就是波拿巴和跟随他的这支大军的将领们。在波罗底诺战役^②之后，深感疲惫和睡眠不足的统帅，虽然又染上了重感冒，但这一天却感到精神百倍。将军们也个个兴高采烈，因为向莫斯科最后进军时刻来到了。

一路上，被焚毁的村落到处都静寂无声，但空荡荡的乡村虽尚未被大火吞噬，却沉默得更令人吃惊了。听不见鸟儿啼鸣，也

看不见炊烟缭绕。阒无人影的景象，更增强了正在默默逝去的俄罗斯秋天的惆怅。部队已经越过莫扎伊斯克县界。侦察兵不时送来报告。为了不暴露目标，队伍采取了预防措施。马匹改在棉软的泥地上行走，禁止唱歌和大声说话。命令号手们必须把铜号收藏起来。凡是发亮的东西，一律都得加上罩。但俄国人却未经战斗而撤走了。去得无影无踪。库图佐夫老人的军队消失了。

一道道沟壕和一座座小丘使队伍的行进提心吊胆。在最高的山丘上发现了堑壕。骠骑兵们分成几个侦察小队，走在前面一英里远的地方，纵队左右两侧同样远的地方，也各派有三人侦察小组。为了看得远一点，他们下了马，爬到树上了望。但是，无论哪里也没有发现俄国军队的一点影子。

将近中午时分，胜利的心情取代了不安。这次艰难的行军似乎即将结束。太阳照射在头盔、军旗和金鹰徽帜上——这变化无常和苍白无力的俄罗斯太阳，突然闪耀出火一般的异常光芒，仿佛同这个孤独的骑马人的那颗科西嘉岛的心在一起欢呼。人们讲话的声音更有自信，目光更加振奋，军官们也开始讲笑话、打招呼了。山丘越来越高，一支队伍赶上另一支队伍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午后两点，法军登上了一座山顶，他们惊愕不已地看到了下

① 在本书 1958 年基辅版原书中，大部注文都作附注，列于书后。经编译者参照 1945 年和 1960 年莫斯科版《维诺格拉多夫选集》第一卷的两个版本，已将注文或插入有关正文，或移作各页脚注。凡属作者原注，均于注文后书明“作者原注”外，其余均为原本编者和译者所注。

② 波罗底诺战役，俄法 1812 年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战役。8 月 26 日俄军由库图佐夫率领，法军由拿破仑一世率领，在莫斯科以西 110 公里的波罗底诺村附近进行。

面“亚洲心脏”的壮丽景色。莫卧儿帝国的这座城市展现在法国人的眼前，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元帅们用发亮的眼睛贪婪地看着莫斯科，他们的欢呼声和壮丽的比喻在空中回荡。他们把它比做“北方的底比斯”^①、“神话般的印度”、“亚历山大新皇的东方巴利米拉”^②。

达律^③元帅的扈从当中，只有一个人没有附和这种浮夸的赞扬声。他就是二十九岁的军事专员亨利·贝尔^④，元帅的表弟。

骑士们汇聚一起，军官混杂在士兵当中，军事专员们距离元帅如此之近，大大超出了按官阶应守的限度。但是，谁也不去注意这种违反规定的情况。种种危险的遭遇和经受过的艰难困苦，已被忘却。这次奇怪行军之谜，以及亚洲国家无法解释的种种意外情形，已不再折磨人了。皮埃尔·达律象是在继续他早已开始的演说，平静而又庄重地吐出一个个流利睿智的句子，表现了拿破仑行政长官的头脑明晰，和贺拉斯^⑤作品出色翻译家的用词优雅。达律不失分寸地赞扬说：

“对大家来说，这将是值得回忆的光辉的历史性的一天。新的时代业已开始。每一个从远征俄国回到祖国的法国人，都将走上光荣的道路。惊异的欧洲，将自始至终注视着我们迈出的每一步，给我们赞扬和荣耀。这是何等的幸运！……”

① 底比斯，古希腊比奥西亚的重要城市。

② 巴利米拉，古代叙利亚的名城。

③ 皮埃尔·安杜昂·达律(1767—1829)，伯爵，法军元帅，拿破仑一世的战友，司汤达的亲戚，以贺拉斯作品的翻译家著称。

④ 马利·亨利·贝尔，司汤达的真名。

⑤ 贺拉斯(公元前65—前8年)，古罗马诗人。主要作品有《颂诗》、《讽刺诗》等。